

平湖历史上的三个“榜眼”

■ 陆爱斌

自明宣德五年(1430)平湖建县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结束,共历时475年,在此期间,平湖科举兴盛,人文荟萃。平湖考取举人668人,进士及第221名。在这些平湖俊秀中,出现了众多的清官廉吏。他们勤政爱民,务实创新,治理有方,流传后世。在平湖历史上曾产生过三位榜眼(殿试一甲第一名为状元,一甲第二名为榜眼,一甲第三名为探花)。一位是平湖当湖的施凤来(明朝),一位是清溪(今林埭)的沈初(清朝),一位是当湖的钱福昌(清朝)。这三位是科举时代平湖的翘楚。

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据史书记载: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多年。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他们的游记中把科举取士制度介绍到欧洲,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五权宪法》)。

为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当局者积极推动“耕读传家”,使“十里之乡,不废诵读之声”成为文化的种子与理想。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然也就成为每个读书人的最高向往。中举,进士及第,特别是中状元、榜眼、探花,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美事。改革取士方式,采取“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寒门学子的憧憬心理。乡试、会试、殿试、桂榜、杏榜、金榜,秀才、举人、进士,特别是“金榜”提名(又分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

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既光宗耀祖,又前程似锦。

平湖历史上的三名榜眼,均位居高官,成绩显赫,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施凤来(1563—1642),字羽皇,一字羽王,号存梅。万历三十五年(1607)会省第一,廷试一甲第二。

施凤来后授翰林院编修,晋东阁大学士,极殿大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戏曲作家。著有《历代名文通考》8卷、《四书提囊集》、《澹宁居士集》、《举业古今摘粹玉圃龙渊》10卷、传奇有《五节记》、《三关记》。

施凤来才高八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高中榜眼后,授编修、升中允、擢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后又晋东阁大学士,入内阁,直至担任明朝的首辅大臣,权倾朝野。但施凤来入阁时,正是魏忠贤弄权的时候,所以,他一直被后世饱受诟病。纵观明代历史,我们还是发现施凤来以大局为重,以中和调停为主。既不得罪魏忠贤,也不谄媚魏忠贤,使明朝能够延续下去。

施凤来后来“冠带闲住”(免去现任职务,但可保留官员身份,回家自省)。归平湖后,为平湖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成绩。歿后,据现钟埭街道大力村(双桥村)村民口口流传,葬于大力村,当地人称“施阁老坟”。

沈初(1729—1799),字景初,号云椒,又号莘岩,平湖清溪(今林埭)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榜眼。

沈初后授编修,擢侍讲,迁右庶士,累迁礼部右侍郎。嘉庆元年(1796)任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转兵部尚书,后又调礼部及户部尚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著有《兰韵堂诗文集》17卷、《御览集》6卷、《经进文稿》2卷、

《浙江采集遗书总目》10集、《闰集》1卷、《西清笔记》2卷、《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历事两朝三十余年。赐祭葬、谥文恪,入祀乡贤祠。

沈初幼年时启蒙于外祖父陆文元并对沈初影响至深,其“兰韵堂”堂名就得益于外祖父。沈初少有异禀,鸿文硕学,在县学,因其读书一目数行下,同学称之为“异才”。后虽科举曲折,但因其才华横溢,总成“榜眼”。在平湖还流传着《传奇出生》、《沈初吃墨水》等故事。

据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其后沈初以经筵讲官为主。户部尚书文恪沈初赐墓在落木园成圩,今新埭镇大齐塘村村部北百米。据实地查看、询问,现仍有一户沈姓望墓人,忠实地守候着他们的祖辈。

钱福昌(1799—1850),原名攀龙,字超衢,号辰田,年幼聪颖,悟性很强,笃志于学。举道光戊子乡试第四,道光九年(1829)进士及第,殿试一甲第二名。

钱福昌后授翰林院编修,皇帝对其有“学问优长,写作俱佳”之褒。辛卯充江西副考官,擢广西学政,内阁侍读学士。修有《汝州直隶州志》,著有《韩鄂书屋诗》4卷、《赋钞》1卷。

内阁侍读学士钱福昌墓,在戈溪坊池圩(今新埭大齐塘村,原秀溪轮窑厂后百米)。2005年,据当地群众反映,有一墓碑在田野中已多年,但文字仍清晰可见。于是文物部门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将其妥善安置,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两米高的墓碑已被断为二截,实为可惜。但字迹非常清楚,明确刻有“皇清诰授中意大夫内阁侍读学士辰田之墓”字样。钱福昌妻有四房妻室,正室高氏,妾三位,张氏、李氏、陈氏,这些记载也清晰可见。



原东湖轮船船码头(本报资料图片)

平湖葛氏传朴堂藏书楼

■ 陆起荣

平湖葛氏,系出东阳。后迁江宁,四百年后复归于浙,居平湖之乍浦镇。

清同治四年(1865)前后,葛氏肇基、丕基兄弟俩在平湖县城内的南河头(旧称鸣珂里)鸣喜桥(俗称马家桥,今存)南北置地建宅,遂由乍浦迁入当湖。肇基居北,丕基居南,时称北葛和南葛。

肇基为北葛始祖,子嗣建有“传朴堂”,南葛子嗣建有“福绥堂”。北葛西侧还有一支布庄葛氏。去年我与几位文史好友专门拜访了该支后人葛余观先生,葛先生当场向我们展示了《葛氏世系图》,内含南河头的三支葛氏资料。

葛肇基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南市办起开泰木号。先与杨氏合资,后杨氏离去,遂为葛氏独资,时值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建筑业发达,葛氏抓住机遇发家致富。葛氏自己在平湖建起了花园宅第及祠堂。子弟们也开始了读书求功名的生活,肇基子葛金琅(1837—1890)发愤读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丙戌科二甲进士,曾任那部主事、户部郎中等官职。葛氏还从事金融业,开设同裕钱庄,后又设同裕康记钱庄,还与人合资开设同盛钱庄。葛氏当年真的是经营有方,终成为平湖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葛氏藏书是从葛金琅开始的,他豁达多智,性好读书,酷爱善本古籍及名人书画。其长子葛嗣深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顺天榜考中举人,受任户部七品小京官。

当时父子俩同居京师,均酷爱古籍及书画,购书达数万卷。当时西后擅权,朝政混乱,葛金琅在京为官时间不长就辞官回乡,里居未几而卒,时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其子嗣深,因父病促归,归而闻丧大恸,以哀毁卒于同年,距父丧仅五个月,年仅二十九岁。此后,传朴堂的集藏为葛嗣澎(1867—1935)所承续。

葛嗣澎继承父兄遗志,为充实传朴堂藏书,花了很大的功夫,他多次出游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及陕西、江西等地,每到一地,搜访书市,每次必满载而归。日积月累,藏书充盈,原先的书屋已不敷使用,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鸣珂里宅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名“守先阁”,并清海盐张元济先生题额。张元济在题额时,还撰有《为平湖葛氏守先阁题额识语》短文——

……稚威亲家仰承先恩,思有以光大之,光绪岁乙亥,乃建斯阁。移书度其中,名曰“守先”,所以凿楹之训也。越三十余年,积书逾四十万卷。稚翁复与犹子荫梧学部编订藏目,将以行世,兼示后人,洵可美已。稚翁命书阁榜,谨志数言,以志钦仰。

荫梧学部指嗣深之子葛昌楣。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传朴堂四十余万卷古籍中,宋代善本孤本多达四千余种。此外明刊本及抄、校、稿本数量更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乡邦文献,既精且多,其中还有不少为罕见之本,如嘉庆十年(1805)路铎续修之

《平湖县志》,张元济之“题后”以为系葛氏所独有,并云“余收书数十年,仅获见此一本”。此志后来逃过一劫,现珍藏于上海市图书馆。此外还集纳了全国各地地方志多达三千四百余种。还收藏了清代历朝科举试卷数千种,有朱卷、抄校本、稿本,明代的也有不少。张元济先生曾评价说:“传朴堂藏书之富,曷戾乎浙西之冠。”此言不虚,传朴堂的藏书不仅是平湖藏书三大家之首,而且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南浔刘氏嘉业堂并驾齐驱,构成全国闻名的三大藏书楼。

张元济为葛氏收藏古籍竭尽心力,一是张氏与葛嗣澎系亲家关系;二是葛夫人徐琮选系海盐人兵部尚书徐用仪的女儿,张、徐两家均为海盐籍。廩贡生出身的葛嗣澎,字稚威,号词蔚、思椿、竹林。他以字行,老辈人均称其为葛稚威。早年任过工部主事、刑部主事等衔的小京官,光绪二十六年前,遵岳父官至兵部尚书海盐徐用仪之命,辞官返乡,继承父兄事业遗志,兴文办学。

其父在世时,其传朴堂收藏包括守先阁藏书、爱日吟庐书画两部分。葛氏爱护图书,每年夏初必返书楼,督办晒书事宜,而乐此不疲。藏书楼还雇有抄写及修书高手,借抄缺书,配补残叶,葛氏亲自过问,他还请徐敦定编书目,徐氏为徐调孚之父(徐调孚曾任北京中华书局文学组组长,致力于文学古籍出版,1972年出版《柳文指要》时作者章士钊指名要他负责。当时章士钊为中央文史馆馆长)。

葛嗣彤与张元济既是亲家,又同是藏书家,所以彼此之间常互借其缺书而抄藏之。葛嗣澎好收藏地方志书,张元济先生则因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各地有分馆,乃嘱令代购地方志事。张元济民国九年(1920)一月二十七日日记:“本日由葛词蔚处借到《茗斋全集》壹拾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九日致葛嗣澎书:“《铜陵县志》闻已抄得,极喜。寄到后尚拟假抄,定邀慨允。”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四日日记:“托甘肃教育视察团……代购甘肃志、县志。内有二部者,系词蔚托办。”总之在张元济先生的全力帮助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葛词蔚的守先阁古籍善本增至四十余万卷。

与此同时,葛氏所藏的宋元明清名家书画也从166轴增加至376轴,而民国时期名家吴昌硕、陆廉夫、张大千、吴湖帆等的作品尚未计入。还藏有米芾的《山水卷》、巨然的画卷、范宽的《晚景图》和张灵의《灵芝秀石图》等,均系稀世珍品。

葛嗣澎先生对收藏的珍本古籍,不像有些收藏家那样秘不示人,而是乐于传播,陆惟鏊在编撰《平湖经籍志》时就大量使用葛氏守先阁藏书。其所藏的《嘉禾征献录》由金兆蕃刻入了《槐李丛书》;葛嗣澎先生还是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编的《四部丛刊》的发起人之一。

张元济在编辑《丛书集成初编》时,就曾向传朴堂借

抄《艺海珠尘》、《功顺堂丛书》等有关序文和缺书,撰成了《丛书集成总目提要》等等……

传朴堂藏书,常常供人查阅抄录,陆维钊先生曾回忆:“葛氏为人豪爽,愿意翻出藏书、藏品供友人观赏。……惟其祖传规矩,可以在其舍抄录,不肯让人借回家去。其交好者,甚至供午膳,由仆妇端至书房。”杭大教授胡士莹先生早年任稚川中学国文教员期间,也曾大量阅读传朴堂藏书,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史专家谢国桢曾参观过葛氏藏书。他在《三吴回忆录》中说:“……其中最精的要算乡邦文献了,如《李愿园文集》、朱为弼《茶坪诗集》等书,收集不下百种。”

旅居苏州的平湖籍藏书家屈燮(1880—1963),字伯刚,号弹山,曾经为葛氏传朴堂藏书编目。据屈氏回忆录《绝望自纪》稿本记:葛家藏书精华有四:一是地志收藏最富;二是平邑先哲遗书,秘本稿本往往有之;三是明人集部最为完备;四是丛书,大者小者种类至多。由此可见葛氏藏书之富。

葛氏藏书毁于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当年十一月五日,日寇于平湖全公亭一带登陆,六日,多架日机空袭平湖,轮番轰炸扫射,居民纷纷外逃,遂成空城。此后月余,平湖陷入混乱。最后,平湖鸣珂里葛氏住宅、藏书楼、祠堂连同稚川学校,在大火中化为废墟。大部分藏书也成了一堆劫灰!

邑人冯养浩先生在其所著的《当湖蒙难录》中写道——

焚葛氏守先阁。我邑鸣珂里葛氏宅内附设稚川两等学校。日军第二次入城,过其门,见门前标语,注视良久,入校放一火枪出,焚毁校舍数十间,其余房屋未殃及也,此校役姜二观亲见之。后乡人连次洗劫,复两次纵火,于是屋瓦尽并宗祠暨“守先阁”悉付一炬。“守先阁”者,葛氏之藏书楼也,三世七十余年所收储元槧、明刊以及两浙往哲文献不下数千种;各直省、府、厅、县、州志积至千六七百种,而尤以方志、禁书、别集三种最为罕见而难得者;其他金石书画之属,收藏亦富。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燬烬,此盖为吾湖文献所关,若仅仅谓葛氏一家之损失,抑末也。

这是当年冯先生的原始记载。

葛氏藏书一般均称毁于抗战之初,其实并未全毁。除少量为其家人携出之外,还有一些善本流入了大汉奸陈群洋的泽存书库。一九四三年,其曾经编了本《南京泽存书库图书目录》,许多善本古籍标明旧藏之所,内就有注明“传朴堂葛氏旧藏”之书。至于如何流入泽存书库,情况不详。这批书当然也不排除当时流民趁火打劫的可能,后被日伪所掠,送进泽存书库。抗战胜利后泽存书库为中央图书馆所接收,这些图书现应该在台湾,葛氏传朴堂遗书当也有部分在内。

全公亭与范承谟

宋一良

全公亭集镇为现浙江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独山镇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历史上的全公亭则位于全公亭集镇北侧钱武肃王(即吴越王钱镠)庙左,亭下有井,康熙年间重修,现已无迹可寻。钱武肃王庙,即钱王庙,全公亭人习惯叫“大庙”,其所在区域被称为“大庙头”,曾是原钱塘镇人民政府驻地,1993年11月后开辟为住宅小区。

范承谟与全公亭的关系发生于清康熙十年(1671)春仲,时任浙江巡抚的范承谟奉命清丈屯地,率文武僚属来到全公亭,并舍于亭左黄氏“志在堂”,对全公亭为何名“全”而不是“钱”也感好奇,曾作过调查,离开前赋《留题全公亭》诗一首——

三月春光澹碧山,恰来花发又花残。忙中岁月驱驰尽,海上风云指顾间。杜老漫吟归马逸,庄生徒羨白鸥闲。茅庵一宿仍卑湿,未许浮生半日闲。全公亭晚清诗人山风辉以“全公亭外往来忙,亭裏残碑卧夕阳。一自范公题咏后,至今父老颂甘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

范公承谟(1624—1676),字觐公,一字螺山,奉天(今沈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次子。进士出身,曾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三藩之乱期间,被耿精忠囚禁两年之久,最终被其绞杀。朝廷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

康熙七年(1668),范承谟任浙江巡抚。当时,清朝建国不久,百姓尚未完全恢复生产,宁波、金华等地荒地非常多。浙闽总督赵廷臣上疏朝廷,请求免除赋税,康熙帝便命范承谟实地勘察。经过考察后,范承谟上疏,请求免除荒田及水冲田地的赋税,共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多亩。康熙八年(1669),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都因水灾导致饥荒。范承谟便拿出布政使库银八万两,到湖广购买米粮,以平抑浙江粮价,救活灾民无数。后来,范承谟又上疏道——

漕米改折,每石折银一两。明年麦熟后,再补征白粮,以三年为限。重灾区依例加以免除。

康熙帝批准。康熙十年(1671),范承谟因病请求解职,被召回京师。浙闽总督刘兆麒、浙江提督塞白理上疏,表示浙江百姓纷纷请求让范承谟留任。给事中姜希辙、何耸及御史何元英也上表道——

范承谟担任巡抚三年,爱民如子,查办贪墨,革除弊政,深受百姓爱戴。

康熙帝便命范承谟留任浙江巡抚。康熙十一年(1672),范承谟上疏,提到湖州、嘉兴二府的白粮加耗有多有少,请求每石以四斗五升为限,又请求免除温州、台州二卫在康熙九年以前未交的赋税以及石门、平阳没有交足的轻资月粮。康熙帝将这些奏疏都交付户部,命户部讨论施行。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造反,三藩之乱爆发。范承谟察觉到靖南王耿精忠有反心,便上表朝廷,请求暂缓裁兵,又打算巡视边海,征调兵马防御。不料,范承谟的行动尚未实施,耿精忠便已叛变。耿精忠声称有海盗犯境,请范承谟前去商议。当时,福建巡抚刘秉政依附耿精忠,也催促范承谟前去。范承谟知道事情有变,拒绝侍从护卫,孤身前往。耿精忠的党羽拔刀威胁,范承谟挺身而出,骂不绝口。耿精忠素来忌惮范承谟的威望,害怕杀了他会激怒百姓,便把他囚禁在土室中,并给他戴上刑具。他绝食八日(一说十日),却不能死。后来,耿精忠派刘秉政前去劝降。刘秉政见到范承谟,一边向前一边作揖。范承谟命人将他扶下床,奋力将刘秉政踢倒在地,大骂道:“众反贼当受朝廷诛杀,我先夺你魂魄。”

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清军攻克仙霞关,耿精忠打算投降。他找寻托词以求免死,又怕范承谟暴露他的罪行。十六日,耿精忠命人逼范承谟自缢。范承谟的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及从弟范承潜等五十三人同时遇害。范承谟临死之时,戴上御赐冠帽,整理衣袍,向着皇宫的方向九叩首,然后从容自尽。

范承谟对浙江是有恩的,而对全公亭人来说,说范承谟对全公亭有兴趣,还不如说全公亭与范承谟有缘,自此以后,范承谟便与全公亭的历史联结在一起,全公亭人为得到范承谟那样的忠臣大家的关注而深感荣幸。也由此,对全公亭姓全姓钱,时有人追索不辍,倒也发生了不少轶事趣闻。有诗云:“石井荒凉不计年,海滨旧话尚流传。疗人疾病知多少,古诗依然号福泉。”相传寺僧某月夜跌坐,窗外有女窥视。僧曰:窗外谁家女?女即应声曰:堂中何处僧?僧即外视,其女行数武冉冉而没。记之,明日掘地得泉。是年大疫,饮斯泉者即愈,遂拘并其地,福泉或因名欤。咸丰四年(甲寅·1854)里人重落。

又道是——

三千铁箭射钱塘,保障东南武肃王。吴越至今思旧德,年年俎豆荐馨香。

全公亭因何而名“全公”,并不名“钱公”,或许在范承谟莅临全公亭前就已经有了议了,而自范承谟来过后,在原全公亭一带更是众说纷纭,有人疑是“钱公”之误,也有人斥之为巧言附会“拍古人马屁”,还有人说是因全姓两兄弟之故,更有人疑是乾隆笔误。按与山风辉同时代的朱鼎编在其词作一注释中的说法,是“相传昔有兄弟争产,势将入讼。行至中途,风雨大作。遂诣茆亭中,藉草为褥,坐以待旦。其困苦莫可名状。始俱悔,因以所争之产,捐建此亭,名曰‘全公’。言父老议事,务全公道,不可偏袒,以至入讼也”。

有一点相当明确,全公亭境界并无“全”姓人家,且朱鼎编引典中也没有说那家兄弟为全姓,而“务全公道”中之“全”也并不是指姓,但按何阂《重修全公亭记略》的说法,在康熙时就已经名为“全公亭”,却在以后也确实有过“钱公坊”或“全公坊”这些行政区划名称,只因范承谟尽忠后重修全公亭时所立的“全公亭碑”穷搜无着,所以这全公亭到底是该姓全还是该姓钱,也就各有各的说法了。说得再明白一点:事实上,此“全”乃循法从理之念,非姓氏也。所以,自古以来的全公亭之“姓氏”之争,只不过是饭后茶余之话资而已,实在没有实质意义。